

中华人文精神论纲

ZHONGHUA RENWEN JINGSHEN LUNGAN

吴毅 朱世广 刘治立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华人文精神论纲

ZHONGHUA RENWEN JINGSHEN LUNGAN

吴毅 朱世广 刘治立 著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文 冉

责任校对:文 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文精神论纲/吴毅,朱世广,刘治立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01-010049-4

I. ①中… II. ①吴… ②朱… ③刘…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6780 号

中华人文精神论纲

ZHONGHUA RENWEN JINGSHEN LUNGAN

吴 毅 朱世广 刘治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0.5

字数:4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049-4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宝鸡文理学院陕西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经费资助

序

二十多年前，曾看过一部系列电视政论片《河殇》。这个片子从头至尾都表达着这样一种情绪：即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厌倦和鄙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其中有一句台词，大意是说：世界四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都毫无例外地陨落了，而只有“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句台词所表达出来的那种鄙视和厌恶的口吻，那种诧异和奇怪的情緒，那种本来是华夏子孙却要扮成西洋人来审视“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的姿态，至今在脑海中都留有深刻的印象。

是啊！我们这个黄种人的文明，为什么这样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呢？以至于你可以嫌弃它、厌恶它却不能消灭它呢？它延年益寿甚至永葆青春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近年来，出于文化寻根的意识，我先后几次到过陕西宝鸡和甘肃天水。这两个地方以渭河相连，而渭河流域是“人文始祖”伏羲和女祖先女娲、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炎帝和黄帝的诞生之地，也是黄种人的文明即农业文明的发源地。《水经注·渭水》记载：“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牺所生之处也。”《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经过史学家考证，姜水位于宝鸡，姬水则位于关中中部，均是渭河的支流。因此，进行中华文化的寻根之旅不可不到渭水。当我实际地考察渭河流域的文化地理和浏览名胜古迹的时候，由衷地发出心底的赞叹和景仰：这是一片诞生中华文明的圣土！

宝鸡即古陈仓，这里有众多的展现古代文化和文明的遗迹。由近及远地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胜枚举的名胜：张载祠，纪念的是那位曾经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宋代名儒。法门

寺,是供奉佛祖释迦牟尼舍利的佛教名刹。五丈原诸葛亮庙,是三分天下、七次伐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毕生以复兴汉室为业的诸葛亮殉职之地。春秋时期秦石鼓的出土地石鼓山;这里出土的石鼓具有文学、文物、书法、历史等多种价值,而石鼓文为中国现有最早的石刻文字。秦都雍城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及其遗存;毛公鼎、大盂鼎等五万多件青铜器出土地,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器博物馆。周公旦的采邑地周公庙,而周公姬旦正是在周初制礼作乐、倡敬德保民、开一代文化新风并被儒家推崇的圣人。姜子牙隐居垂钓的钓鱼台。周先祖之一古公亶父率族迁徙所到岐山下的古周原遗址(今宝鸡市岐山县);正是在这里,“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史记·周本纪》),建立了周最早的国家组织。再溯时而上,宝鸡还是曾“尝百草”并发明农业、医药的中华始祖炎帝(神农)的故里。市区东南的蒙峪相传是炎帝诞生的地方。南郊清姜河古称姜水,是炎帝部落发祥之地。蒙峪以南常羊山上的炎帝陵相传埋有炎帝所用的衣物。此外,著名的北首岭遗址,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记载,那是早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一种文化遗存,早期遗存为公元前 5150 ~ 5020 年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距今已 7150 多年。

沿渭河而上,即到“秦”的发祥地甘肃天水。天水即古“成纪”,也是“人首龙身”或“人首蛇身”的人类始祖伏羲出世之地(古风台)和“人首蛇身”的人类女始祖女娲的出生之地(女娲洞)。天水素有“羲皇故里”之称,位于天水市西关的伏羲庙,又名太昊宫,首建年代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伏羲是中华民族始祖,传说曾作“八卦”。《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个庖牺氏也就是伏羲氏,他进行阴阳八卦文化创造的传说就诞生在水天三阳川地区的卦台山。该地四面环山,有大小山头九个,中间圆形盆地极为平坦,且有渭河由西向东呈“S”形穿三阳川而过,形同太极原图。还有,距今 8000 年前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原始地画,最早的中国文字雏形,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等等。

渭河流域的圣迹名物虽然多多,但它们毕竟是历经数千年的沧桑流传下来的,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片圣土上曾经现出更多的震撼一时的事件和

人物,只是不被数千年以后的人们所知而已。现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历史遗迹与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同类事件相比,恐怕不过是太仓一粟罢了。

在数次文化考察和浏览中,我结识了宝鸡文理学院的吴毅先生。这位中青年学者由于长期生活在曾经陶冶了无数古代圣贤的渭河文化之中,形成了谦虚和蔼、朴实厚重、好学深思而又干练风行的性格。他在处理纷纭复杂的学院行政事务之后,便在他的清雅斋中沉浸于对传统文明的研究和思考。游览历史文化圣迹的过程中,他是解说员忠实的听众,又是引人入胜问题的提问者,还是在解说员欠佳的场合的讲解者。他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学识和造诣,赢得了同行学者的赞赏和敬佩。在数次相聚之时,我们或徜徉于历史的遐想,或沉浸于文化事件的讨论,或流连于饮酒畅谈的快乐,相得甚欢。更值得一道的是,我们都从众多的圣迹名物之中感受到了古人留下的那种石烂水涸而不灭、历数千载而不朽的伟大的人文力量。

差不多两月之前,吴毅先生把他的《中华人文精神论纲》的文稿寄给了我。文稿由绪论和十六章正文组成,煌煌40万言,展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厚重的知识底蕴、深入的思考和对中华人文精神切身的体悟。真可谓开卷有益,颇受启发。赏读之后,我想,前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即我们黄种人的文明为什么能够“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回答。

文稿的许多观点与我是有共鸣的。一种好的文明和文化,不在于它使信奉它的人们能够攫取多少财富和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而在于它能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如同一个人是否伟大,不在于他有多么强壮的身体和多么英俊的外表,而在于他有怎样的一种精神和品质。中华人文精神是与“天地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如同天地一样永葆青春、永垂不朽。你之所以嫌弃它甚至厌恶它,那不过是因为你对它还没有体悟而已。老子有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日月不为喜暗者而敛其明,大地不为慵懶者而改其广,中华文明不为嫌弃反对者而不放其光芒。

读了吴毅先生的文稿,情不自禁地也想与读者分享关于中华人文精神方面的心得。

“人文”一词盖出于《易传》。《易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者,原指纹路、纹理,也指事物变化运行的轨迹。“天

“文”即天体运行的轨迹,引申为天体运行的规律和规则,即天道。“人文”即人类文明化过程的运行轨迹,引申为人群文明生活的规律和规则,即人道。《易传》所说,谓古代的圣人通过观察研究天之道,以明察时节的变化,通过观察研究人之道,以教化天下之民,使之循道而行,以成文明礼俗。“人文”总是表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凡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消费、社会交往、技艺娱乐、征伐战斗、丧葬祭祀以至于学问思辨等等,莫不与人文范畴相关。

既然“人文”包罗万象,涉及与人类文明化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那么,以博返约,就有“人文精神”一说。“精神”原指人的精气、元神,与人的形体相对。如《吕氏春秋·尽数》云:“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东汉王符《潜夫论·卜列》云:“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即上述意义上的“人文”之精神,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谓一个民族在其文明化过程中所形成并一直遵循的基本观念、信念、原则和精神归宿。

一个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也同样需要一点精神。民族的人文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本质所在。丧失了精神,这个民族的一切创造成果只不过是“物件”的多少而已。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日趋尖锐的今天,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民族人文精神或民族精神是民族性格、习性之上的一个概念,是民族性格和习性的精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习性具有多面性,既有积极的、正面的性格和习性,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性格和习性。人们常说的民族劣根性,就是特指民族的负面性格和习性而言的。民族精神则与此不同,是指优秀的民族性格、习性、意识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凝结,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所创造的文明的精华,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和精神品格。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个民族没有优良的精神,没有优良的品格,就会在民族竞争中丧失竞争力,因而也就不可能长久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史源远流长,长达七、八千年之久。中华文明之所以根深蒂固,历久而弥新,是与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否优越,不凭口说宣传,而要看这种民族精神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要看这种民族精神孕育了什么样的民族人物,以及这些民族人物又为这个民族造就了什么样的功业,贡献了什么样的思想和精神。

我们说中华民族精神是伟大的,那是因为这种精神从一开始就与“天地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内涵之博大、品质之优越,足可以使后世中华子孙引以为骄傲。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从“天地”中来,都是对特殊的民族利益、民族眼界的超越。中华民族精神的品质,可以说就是天地的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性,可以说就是天地的特性。

中华人文精神追求人与我、人与物的和谐共生。《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天地之间有两种力量,一种被称之为“阳”,一种被称之为“阴”。这两种力量相吸相斥,相推相摩,不断地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因此,天地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系统,宇宙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死寂的,都是处在生生不已的状态之中。天地有好生之德,故人应效法天,使万物不断地发育生长。这个原则被古代思想家概括成仁。仁是爱,爱就是使人生、使物生。损害别人、戕害他物以满足自己的生命需要,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为中国人所不齿。正如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所说,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墨子所谓“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张载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戴震所谓仁是生生之德,“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等等,无不秉承的是天地的生生精神。

中华民族把天下共生视为天经地义,把“赞天地之化育”、助天地之生生看成是人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强大了不仅不会称霸世界而且还会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全人类的幸福,其基本的论据根源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确立的这种和谐共生观念和仁爱精神。

中华人文精神尊道、贵德、尚义、忠公。我们知道,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古人把现象界背后自然的必然性称之为“天道”。道家认

为,道是包括天地在内的万物之母,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的动力。万事万物得道而生,不道早已。人作为天地的产物,当然就要遵循天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遵行天道是正,违逆天道是邪。正和邪的分别,就在于行道与否。中国思想史上的不同学派,虽然对于天道、地道、人道各有不同的认识,但无一不强调行道、得道的重要。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俯而读,仰而思,辩而争,今是而昨非,无一不是为了求道。道家学派的杨朱曾经“哭歧途”,也是出于对世人走错道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怜悯。中华民族正是出于对天地正道、天地正气的尊崇和景仰,才形成了尊道而贵德的伟大传统。

三皇五帝年代久远,事迹几乎湮没无闻;尧舜禹之事,史书虽有记载,但也若存若亡。然而,他们尊道贵德的精神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历经夏商周到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和荀子那里被发扬光大。经无数先贤以毕生生命实践的诠释,直道而行,不趋邪曲,居仁由义,尚礼贵信,急公义而贱私利,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贯的精神传统。“以德配天”,“太上立德”、“明明德”、“止于至善”被看成是最大的不朽事业,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讲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孟子所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陆九渊所说“轻重荣辱惟义与否”,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涌现出了无数仁人志士,他们不畏强暴,为维护天下正义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都是出于对天地之间的道义和正气的维护。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因道义而不朽,被后人永远景仰和尊崇。

中华人文精神所崇尚的道义,是天下之公道和公义,而非一家一姓、一人一时之私道和私义。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因而人应当效法天地,尚公而不尚私。先秦儒家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法家讲公私相背,尚公义而克私义。《吕氏春秋·贵公篇》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忠经》提出“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享贞。”顾炎武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孙中山提出,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共产党人提出并踏实地践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条。雷

锋说：“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这自古至今的思想和实践都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崇尚公忠的特点。

中华人文精神崇尚昂扬向上、与时俱进。《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道刚健，运行周而复始，永无止息。人作为天地之间一物，就应该效法天道，不断进取。从此，“自强不息”就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意为努力向上，永不懈怠。在这方面，古人给后人树立了榜样。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墨子兼爱天下，虽枯槁不舍。广大的劳动人民更是勤劳敬业，发奋图强，使中华文明不断地发展与进步。

自强不息表现为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奋斗毅力，更表现为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还表现为一种勇于正视自己的弱点的自省意识。3000多年前，商朝有位君主叫“汤”，被后人誉为一代明君。商汤在他的洗脸盆上刻上九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著名的“汤之盘铭”。它的深刻寓意可以这样理解：每天都有新气象，每天都有新创造。脸是天天要洗的，同样，心也需要天天洗。既除去身上的污垢，又除去内心的渣滓，人才能不断进步。因此，自强不息也包含着自新的意思。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很多的修身、治心的思想。古人把进德和修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德业相互促进，日日都有新发展。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优秀的民族精神，从来就是开放、与时俱进的，像天象的运行那样一刻也不停滞。中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着民族精神的时代内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的精神，航天精神、救灾精神、志愿者精神等等，都鲜明地展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性。

中华人文精神崇尚博厚恢宏和宽容大度。《易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是博厚的，可以容纳和承载万事万物。中华民族从大地那里吸取了这种博厚能容的品质，形成了宽容的精神。老子所谓“有容乃大”，《论语》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荀子所谓“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戴震所谓“以我之情絮人之情”等等，都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博厚恢宏特征。中华作为泱泱大国，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精神和思想也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势。

我们知道,许多人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本身就体现了宽广能容的特点。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神物。传说中的龙,角像鹿,头似驼,眼如兔,颈如蛇,腹似蜃,鳞如鲤,爪似鹰,掌如虎,耳如牛。人们对它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更欣赏龙来源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崇拜的说法。相传最初的华夏部落的图腾崇拜物是一条蛇。凭借当时最高水平的生产力,华夏部落不断地发展壮大,不断地融合接纳它周围其他的部落。华夏部落每把一个部落融纳进来,就把这个部落的图腾的一部分加在本部落的图腾——蛇的身上。这样,当中原各部落最终统一的时候,一个新的图腾形象——龙也就定型了:驼首、鹿角、兔目、牛耳、鳄吻、蛇身、虎齿、鳞鳞、鹰爪、鲤须、麒麟尾……它几乎汇聚了各种灵物最雄美的部件,因而显得异常神奇,极其独特。龙的诞生本身就体现着中华民族和谐一致、宽广能容、敦厚能载的博大胸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北来的少数民族,印度来的佛教,西方来的文明,毫无例外地都容溶于中华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这种大海般、大地般的气度,在其他的民族精神中是不多见的。

中华人文精神不仅崇尚天地大道,也追求以人为本。孔子说:“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朱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论语集注》)这也就是说:道是自然的必然性,其特点是无为;人是自觉的行为主体,其特点是有为。只有发挥出人的自觉的主体性,道才能够弘大,才能显出神奇的效力。荀子指出,不应该“大天而思之”,而应该“制天命而用之”,也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礼运》强调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认为人是天地之间最优越、最重要的事物。《中庸》提出,人能够顺天之时,因地之利,可以赞助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并而为三。因此,古人称人为域中“四大”之一,“三才”之一。这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敬鬼神而远之”,注重现世、尊重民意的以人为本观念,就成为中国人的最基本观念和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使百姓足食。自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到孙中山倡导“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到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科学发展

观”和“以人为本”，无一不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中以人为本的内涵。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是人民，“以人为本”重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以人为本问题上与前人不同的理解。在历史上，不乏轻君重民的思想家，不乏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清官，但都不能与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比。宋朝的包拯，一生为民，不惜得罪皇族权贵。清代的林则徐，曾因虎门销烟，为民除害而名垂史册。然而，在封建士大夫的心中，他们是在人民之上的高贵者，他们为民众所做的是对人民的恩典。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革命的事业，人民的解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靠小米加步枪，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赶走了侵略者。同样为了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焦裕禄、雷锋、孔繁森、杨善洲等等无数优秀共产党员，以自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对以人为本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以人为本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行动，是精神。

中华人文精神是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中华各族人民共同铸造的。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的中国人，而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中国人又不断地发展、提升着中华人文精神。我们应该看到，市场化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在逐渐凸显，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庸俗主义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和培育中华人文精神，是实现民族真正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上述之论，既有旧见，亦有新得，以应吴毅先生之嘱，是为序。

焦国成

2011年8月末于伦敦

前 言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独步于世界文化前列，中华文明以其辉煌灿烂的景象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地生活繁衍在古代中国大地的重要支撑便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延绵不坠。跌宕起伏而薪火相传、博大的中华文化以其早熟高华的气象和伦理政治、天人合一的同构特质，以海纳百川、吞吐八荒的气概消解着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激流险滩，溶化了中华民族内部问鼎中原多种少数民族文化，使征服者总是被先进的华夏文化所征服，并糅合统同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同时伴随“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汉文化内部的诘难，最终建构起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的文化力、融合力、生命力，不仅消解了无数次内外文化的强烈碰撞，并使多种外来文化学派融合归流到统一的中华文化之中，它以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维系着中华民族延绵不绝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演成彪炳史册的中华文明。中国历代虽有刘、李、赵、朱诸王朝的频繁更迭，却无文化统绪的沉沦，虽有鲜卑、匈奴、蒙、满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却无文化的改换门庭，且最终都被汉化而汉化愈彻底留存中原愈久的奥妙即在于此。所以破译中华文化之奥秘也是解读历史的一把金钥匙。

与“天文”相对应的“人文”精神实乃传统文化的精髓。富含以人为本、关怀人生，关照人的现世际遇和伦理和谐、统合天人、家国的人文主旨，通过“教化天下”、“化成天下”的巧妙途径臻至天人的高度和谐，实现国家政治与人生追求的有机统一，经过几千年士人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和统治者的提倡维护，中华人文精神日益宽广深厚，并不断推陈出新，使人文情怀、人文思想弥漫于中国几千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社稷政治、小到山川河流，无处不渗透着人文精神、人文足迹。当人流连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刹庙园坛、幽径曲廊

之中,散发着悠远淳馨的文化芳菲就会扑面而来,它不仅常常使外宾艳羨倾倒,而且也使国人钦羨喟叹。

历时三十年的执教生涯,尤其是近年来反观兴盛于九十年代且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热”现象,并由此精进衍生的人文精神的探索,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研讨中国几千年政治动荡、经济兴衰、文化勃萎,冥冥感触到一只无形而巨大的手主宰着中国的漫长历史,通览先贤大师的鸿篇佳作,凝神思索,一个大致轮廓渐次明晰脑际,这便是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统绪之中,而且重要的存在于相对客体的历史典籍、文学作品及历史原貌的古人实际生活留存下来的碑帖古迹、文物名胜之中的人文精神,这种历史——文化逻辑结构暗合的景观,而且是亘古以来一以贯之的恢宏景观令人激动不已。

中国当代是由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与西方文化多元交融的新文化。一个匮乏文化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历史已经证明,但当文化失绪,国民便会精神迷惘懵懂,社会就会失去理性的航向,文明的光辉就会暗淡暮罩,因此建设一个强大、富足的经济大国之际,且莫忽略建构一个科学高迈的现代文化,整合道德、重建人文便成为摆在国人面前,尤其是具有良知和使命感的学者面前一项十分严峻的伟大课题,为此,自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肇始的近百年的对文化命运的艰苦探索,一大批大师学人呕心沥血,付出了无数令人难以体味的艰辛耕耘,为重构现代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括近百年的文化发展,简言之,可用“古今”“中外”概括百年文化的板荡碰撞,其核心不外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地位问题。激烈论战于上世纪初的“国粹派”和“西化派”,均失之偏狭地提出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的方案,并未科学理性地对待古今文化、中西文化貌似对立冲突、实则能统一融合的文化现象,从而陷入形而上的泥潭。中国传统文化于近代落伍于西方文化,既有观念形态文化自身的问题,也有政治、经济的深层病因,就文化自身而言,传统文化的活力之外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吸纳外来文化的传统,佛教文化被消融安顿便是明证。传统文化统摄中华民族几千年,并创造了恢宏灿烂的中华文明,足见传统文化之伟力功业,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当今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扬弃传递,全盘西化实乃断裂民族经脉,纯

粹是移植西洋文明,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国粹派”拒斥一切外来文明、死守传统文化的所有遗存、良莠不分,已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文化开放发展的需要,也悖逆了传统文化开放开明、兼容并包的优秀传统。理性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继承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精神,敞开胸怀吸纳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拒绝其他文明中反科学不文明的舶来物,使之重构起一种会通统同的新文化,这种继承既并非恪守传统、执古不化,也不是一味西化、全盘照搬,而是“中西合璧”,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成符合时代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新文化,使继承、排斥、超越、统一有机契合,唯此方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宏业,方能使传统文化焕发出青春的光彩,熠熠闪耀于世界文化之巅,为人类幸福和谐的未来做出无愧于先民的伟大贡献。

百余年后的今天,“五四运动”的狂飙过后,匮乏理性的反对孔教、打倒孔家店、反全盘西化的主张都应成为昔日号咽,当人类步入知识经济、网络文化时代之时,仍进退失据地徘徊于二者之间已是无补于世,当今的首要之务是结束漫长的“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的口诛笔伐而统一到重建当代文化的伟大工程中来,其工程建筑的基本框架应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西方优秀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统一,其中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需要与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以开放发展的姿态引导传统文​​化前进方向,同时又要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沃土之中,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传统文化需要批判糟粕性封建时代的毒素,存留其合理内核和历经检验而浸透国民心理灵魂的精华,吸收古今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有机地统合为当代中国优秀文化,使其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传统的士人学者以传道授业为己任,追求道德文章,孜孜不倦的传递着文化的薪火,当今学者的使命除传统的职守外应以整合人类文明、追求真理、创造新的科技文化伟业为己任,上下求索,探讨人类共同发展的途径和归宿,建构地球村安谧幸福的栖息家园。立功、立德、立言三大不朽乃中国士人学者的三大人生目标,其失之偏颇的是其建立在个人功利色彩的境界和道德文章的狭隘追求上,已不应再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简单追求,而是要建立包容自我的人类及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追求,并非攀登官价值文化下的“致君尧舜上”和

“作宰辅”、“为帝王师”的单一的仕宦之途，而应将个人学术旨趣与重建国家乃至世界当代文化的命运统贯起来，坚韧不拔地去追求。更不应该是在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社会里，仅仅将知识作为智力资本谋生苟安，而应为追求人类终极目标——幸福和谐的共同理想而奋进。

我们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几十年，虽说对传统文化时有触及，但就传统教育体制下历史学科是不大直接关涉思想文化领域的现象，加之本身国学素养浅陋，当对博大浩瀚的传统文化真正对话之时，确有望洋兴叹之感。聊以自慰的是十余年来，有一批大师的启迪，我们挤用闲暇时间披阅经典文籍，囫圇吞枣，日积月累，也稍有管窥。

史学工作者既要应有才、学、识、德，也应有胆，胆是理论创新的基石；创立流畅生动、雅俗共赏的史学文风不失为挽救夕阳倾颓史学命运的一种途径。本应践履自己倡导的“史胆”，言他人之未言，综括贯统中华人文精神之大系，并以清爽飞扬生动的语言勾勒人文精神的风貌，孰不知，由于根底浅薄，难以驾驭，旧既未破新亦未创，所言所论仅为先哲们的笼统归纳，遣词造句又流俗于论文体的连加引文之中，使本书略显诘奥。更为遗憾的是本书初衷仅陈列人文精神的现象，而历史逻辑的内容由其真实的历史包括历史典籍及历史遗存来佐证使其成为历史专著之一种，但在执笔过程中，感到如此这般，便会文字大增，冗长无际，故又复归于时今传统的大多引论传统经典为主线的写作方法上，不啻有袭窠臼之嫌，且将学术引入我们的弱点误区。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宏愿己任，几千年来无数学者大师为中国文化的筚路蓝缕，他们仰观星空，俯察大地，“九问”上苍，究探人世，济世安命，厚德载物，成已达人，饱蘸心血墨彩书写文明华章，他们以高洁的品格塑造铸写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其功业可嘉可贺，可圈可点，我们晚流所做的一点仅为抛砖之功。汤因比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文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倘能为中国博大宏伟的新文化重建贡献绵薄之力便是我们的没齿欣慰。

由于初稿成书仓促，文化现象的诸多问题未遑顾及。虽然力戒错讹，但脱衍纰漏在所难免，且缘学识水平有限，在深邃浩瀚的文化海洋里，只鉴识学海